

46 MR/MSX
●章开沅 主编

CS3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⑧

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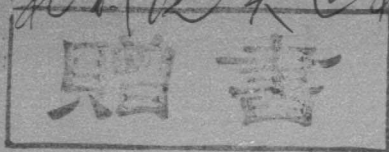
马君武集

(1900-1919)

莫世祥●编



中科院莫世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君武集

莫世祥 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字数 425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精装)

ISBN 7-5622-0715-1/K·63

印数: 1—1200 定价: 13.00 元

前 言

“江南握手笑相逢，识得而今马贵公。
海内文章新《雅》、《颂》，樽前意气旧英雄。
摆[拜]伦亡国哀希腊，亭长何年唱《大风》？
右手弹丸左《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

诗人柳亚子在清末写下的这首“怀人诗”（《磨剑室诗词集》上集 36 页），形象地描述出当年马君武一手赋诗作文鼓吹革命、一手研制炸弹倾覆清廷的英姿，概括了马君武在辛亥时期的历史功绩。

马君武（1881—1940），是近代中国杰出的革命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出生在流寓广西恭城县衙署的一个湖北籍幕僚家庭。他的一生，可以依其驰骋政坛与执教校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约从 1900 年参与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勤王”之役起，至 1926 年春退出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止；此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终至 1940 年病逝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在马氏前期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约十年间的奋斗历程。其时适值旧民主主义革命兴衰起伏，时代的风云变幻，导出一幕宏伟悲壮的活剧，马君武便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要角。本集因此辑录 1900—1919 年马氏的主要著译及其此后的有关回忆，俾有助于读者了解马氏在此期间的活动乃至近代中国的政局变幻。

(一)

十九世纪末叶的广西，虽然依旧闭塞落后，当时的省城桂林却也开始渗入文明开化的时代新潮。1894年底和1897年春，康有为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倡议变法维新。变法运动夭折后不久，广西第一所施行新式教育的正规学堂——广西体用学堂在桂林正式开学。主其事者，就是几年前因不满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出任台湾“民主国”伯玺天德（总统）的广西灌阳县人唐景崧。唐与康有为一直交往甚密，他出而执掌教坛，遂使一度泛滥于桂林绅学界的维新改良思潮得以潜行不息。随母寄居桂林的马君武，在青少年时期就受洗于这股潜行的新潮中。

还在14岁的时候，君武已从邻里口中及时了解到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台湾乙未之役，并且见到从台湾内渡返桂的唐景崧。在他的少年心中，涌起御敌救国的激情。君武16岁那年，康有为再次来桂讲学，并与唐景崧等人发起成立“圣学会”，刊行《广仁报》。桂林士人龙泽厚、况仕任、龙应中等师事康有为，成为“圣学会”的骨干。君武年少，未克入康门，遂从龙、况诸乡贤交游问学，阅览维新书刊，显露出追求新知的浓厚兴趣。据说，他曾署名“马桐”，撰文投送《广仁报》发表。其后广西体用学堂招生，君武名列前茅，尊唐景崧为恩师，专攻西学，旁涉经史，以“学为圣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由于君武等少年学生不满西太后等顽固派镇压变法，在日记作业中径直评点朝政得失，学堂提调陈绥瑄以犯上违禁为由，出示惩戒。受惩学生愤而撕毁告示，君武与同学邓家彦、秦嗣宗出走香港。邓、秦二人转往澳门就读。年方19岁的马君武则以忧国伤时之心，立救亡图存之志，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谒康有为，执弟子礼，从此开始救国拯民的政治活动。

从1899年底到1900年上半年，唐有为一直在海外策划“勤王”之役，以图“保皇保国保种”。最初的战略部署是：“以全力

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康有为与保皇会》45页）。唐有有为将广西列为“勤王”举义之地，除计划借助广西会党武装起事外，还欲倚重唐景崧秘密联络广西官绅起而内应。马君武是唐氏高足，他的到来有助于康氏了解与进一步布置广西方面的“勤王”行动。因此，康即委君武以八桂始难重任，资遣返桂，伺机大举。君武慨然应命，赋诗言志：“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不料，就在他兼程返桂途中，传来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惨遭失败的消息。清廷在南方各省通缉起事党人，维新派以武力勤王改制的计划完全破产。君武抵桂后，韬迹家中，无所作为，遂于1900年冬出桂求学。在漓江夜航的孤舟上，他追抚往事，对先前热衷的保皇改良之道发生怀疑，不由得怅然自问：“茫茫前路我何之？”（《漓江舟中》）

次年，君武留学日本，经汤觉顿介绍，见到改良派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梁启超为时局激励，正倡导“新民”学说，强调救国亟需改善民德、民智、民力，造就自立于二十世纪的一代新国民。“保皇”与“新民”，同属君主立宪政治方案制约下的策略口号，但后者倡言自由、平等、博爱的“国民精神”，对怀疑保皇之道却未矢志革命的青年学子来说，仍有新的吸引力。君武赴日前，曾赞同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即认为“今世之主张革命者，徒求效验而已，无造原因者；皆求为华盛顿、拿破仑，无甘为福禄特尔、卢梭者，此所以无功也”（《女士张竹君传》）这一主张与“新民”说的论点颇为相似，君武因而对梁启超十分钦敬，赋诗赞其功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壬寅春送梁任公之美洲》）。他积极为《新民丛报》等改良派创办的报刊译稿撰文，附从“新民”说的某些主张，鼓吹“欲改革中国，则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梁启超同样信任和倚重君武，1902年春梁离日赴美，曾延君武代理编辑《新民丛报》。梁、马交谊既笃，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既近，勤力笔耕的马君武在1902—1903年间很有希望成为“新民”改良

论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然而，就在这时，君武突然中断与康、梁改良派的长期交往，放弃维新改良主张，一变而成为留日学生中最早追随孙中山宣传和组织革命的核心人物，从此将民主共和政治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毅然从改良转向革命呢？

毋需否认，人际关系的亲疏变化可以左右个人的政治选择，梁、马交谊的逆转促成了君武转向的情感因素。当时，君武正当青春年少，希望在贫寒的求学生涯中找到挚诚的知己与伴侣。梁启超托名“羽衣女士”，在《新小说》上连续刊出长文《东欧女豪杰》。君武羨其文而慕其人。梁等竟故意怂恿君武与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函会晤，留学生界一时传为笑谈。君武纯真的感情遭受谗弄，愤而与梁等疏远。他与改良派的交往随之冷淡下来。

与此同时，君武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联系却日趋密切，从而造成君武转向的有利条件。君武在1901年冬到达日本横滨之后不久，便由日本志士宫崎民藏介绍，结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已因倡导革命，蜚声海外。与孙晤谈后，君武语人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邓家彦：《故工学博士马君武少年轶事》）这表明，他钦敬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视孙为继康、梁而后起的一代领袖人物。此后，君武按照孙中山建议，离开改良派控制的横滨大同学校，到东京留学，住秦力山寓所。秦力山曾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流亡日本后便抛弃勤王改制主张，转而鼓吹“革命仇满”。相同的经历，使君武逐渐接受革命的影响。这时，才华学识与梁启超匹敌的章太炎也在东京鼓吹“种族革命”，君武乃从章学而益疏梁。

自然，个人的政治抉择不仅仅为私人交谊所左右，最终还要受时局发展所制约。在紧迫险恶的内忧外患面前，“保皇”、“新民”的改良主张毕竟显得过于软弱迂缓，唯有以革命开启民智、倾覆清廷以拯救中华的激烈主张，最能沸扬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因

之鼓荡的革命风潮，便成为君武转向的根本动因。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纪念明朝灭亡为名，鼓吹反清革命。在清政府与日本当局威胁下，梁启超等一些署名赞助人先后惧祸退出。发起人名单上最后只剩下10人，其中一人便是马君武。君武从此在政治上与改良派分道扬镳。1903年1月29日，君武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旧历新年恳亲会上率先登台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到义愤填膺处，他不禁声泪俱下。湖北留学生刘成禺继之而起，重申革命排满主张。马、刘二人的演说使留学生会馆响彻革命的呼声，与会清朝官吏惊恐不已。据刘成禺回忆，此次演说，乃遵照孙中山事前布置而行，旨在震慑清廷，影响全国。不久，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要求沙俄撤兵东三省。4月30日，上海绅、商、学界千余人举行集会。蔡元培致开会词后，君武上台演说，呼吁保全中国国土主权，并领与会人员同唱《爱国歌》。“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苏报》1903年5月1日、8日）

君武在洪波初泛的革命浪潮中锻炼成为矢志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先行者。当这年8月出版的《新民丛报》连续刊完他写的“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后，他不再向该刊供稿，以示与改良派断交。9月间，君武与廖仲凯、何香凝等人专程谒见孙中山，真诚地“表示赞成革命”。孙中山“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事可以视为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先行者服膺孙中山领导的开端，君武等人从此协助孙中山发动和团结留学生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创建革命政党。孙中山十分重视此次与廖、马等人的会晤。十余年后，他总结革命历程，对此仍记忆犹新，赞此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孙文学说》）。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事前，君武与黄兴、陈天华等8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在同盟会

成立大会上，君武提出联合满人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主张，得到与会者赞同。据当事人回忆，当孙中山在会上演讲时，有人发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样办？”君武当即站起来回答：“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满洲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话毕，与会者全体鼓掌，孙中山也鼓掌（季四光：《在辛亥革命中的马君武》）。显然，君武道出与会者一致的见解，他们共同择定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

(二)

1902—1903年，既是君武在政治上重新作出抉择的关键年代，又是他在笔耕中首获硕果的丰收时节。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君武以惊人的速度，达雅的文笔，接连翻译出版日本福本诚《法兰西今世史》，英国达尔文《天择篇》、《物竞篇》、斯宾塞《女权篇》、《社会学原理》、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著作，还发表译介西方新学和抨击时弊的文章二十余篇。虽然这些著述大多是在梁启超等改良派赞助下作为“新民”学说的附属宣传品而问世的，可是它们实际上已经突破“新民”学说，而从不同的侧面为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启民智”。

介绍西方近代民主共和历程与自由平等学说，以针砭国内积弊，展示救国新途，是这一时期君武译撰的主要内容。在宣传共和制、抨击君主制方面，君武提出，中国自夏禹传子、废止禅让制以来，“民贼代兴”，“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正是君主专制造成国弱民衰。法国实行共和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欧洲文明开化最先之域”。他因此急译《法兰西今世史》“以饷同胞”。他在译序末尾着意指出：法国在1793年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之前，也曾“困于暴君专制，法国人民之困苦，正与吾中国今日之地位无异也”。这篇译序写于1902年4月，其时君武正与章太炎等人筹议发起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译序便闪烁着倡议共和的革命潜台词。此后，君武又摘译法人所著《共和原理》一书中有关共和与君主政制不同、国运盛衰各异的论述，赞其“鼓吹共和主义，中多明白痛快之论”（《欧学之片影》）；译述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生平历史，讥其维护君主制，“与民权自由之大风潮为仇敌，卒之不免于败，其愚亦可怜矣”（《民权自由之敌奥太利宰相梅特涅传》）。寓论于史，兴亡可鉴，中国今后的出路，尽在不言而喻之中。君武就这样在清廷文网罗织之日，巧妙地向国人进行共和启蒙教育。

共和制度的创建有赖于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与确立。在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下的中国，前者是对国家政体的否定，后者是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后者无疑比前者遭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使国人如实了解近代自由学说，君武特地翻译英国著名学者穆勒所著《自由原理》一书。梁启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欣然作序，誉之为继严复《天演论》之后，“吾国得第二之善译本”。《译书汇编》为此译本刊载出版广告说：“译文渊雅，义理精要，无非切中吾国时弊之言，诚中国一切政治道德改革之明镜”，“而于吾国前途之文明发达，实大有影响也”。这一广告虽然不无溢美之词，却也道出君武传播自由学说的功绩，适足为梁启超的评价作一注释。还值得一提的是，君武曾以传神之笔，为清末歪曲、防范、反对和限制自由学说者立下存照：“其轻薄者，……借自由之名，以为罪恶；其谨厚者，乃鳃鳃然防自由之有流弊，相戒不敢复道，甚有诋自由之说为异端，诋唱道自由之人为妖人；而世之所谓达人名士者，其论自由也，亦仅以自由当有界而不可以无限一语为说，夫是则何足以尽自由之意味也。”（《弥勒约翰之学说》）逆视这一存照，有助于今人了解自由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在传播自由学说过程中，君武注重宣传男女平等的主张。这与他最初倾慕广州女医士张竹君并受其影响有关。他曾特意为其立传，赞扬其自尊自强的言行，“以唤起中国二万万睡死腐败妇女

之柔魂”（《女士张竹君传》）。此后，他翻译出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著《女权篇》，摘译穆勒所著《女人压制论》一书的要旨，译述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力的宣言和主张。君武主张把争取民主共和与争取男女平等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他提出，欧洲今日之文明，来自两大革命，即“君民间之革命”与“男女间之革命”。而在专制国家里，人民为君主的奴仆，女人亦必为男人的奴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弥勒约翰之学说》）君武关于共和革命必须与男女平权并进的主张，意味着要把革命对专制国家政权的冲击扩展到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以便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树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风尚。这在当时共和启蒙宣传中是难得的醒世之论。

为了建树新的社会风尚，君武强调以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精神改革中国的国民道德，摈弃愚昧落后的社会陋习。他在《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茶余随笔》、《论公德》等文章中，多次引述西方道德伦理学说与外国在华人士批评或丑化中国社会陋习的评论，以唤起世人对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视。他指出，中国旧有道德培养驯厚谨愿的奴隶则有余，培养活泼进取的国民则不足。其原因，一是专制君主独尊儒术，以孔学作为禁锢国民思想的道德规范；二是国民因循守旧，以风俗为公理。中国文明因此不仅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屡遭暴君芟夷、外敌侵扰。为此，君武提出“创造文明之国民不祥”的警句，以警醒世人勿溺于昔日荣耀而拒绝吸收他方文明。他倡言，改革道德，“当输进欧美各种之道德学说，抉其精以治吾之粗，取其长以补吾之短，而其要尤在鼓励人人有自由独立之精神，养成人人有别择道德之智识”。以自由、独立、文明的近代道德风尚改造国民性，创立新的国民精神，本是“新民”学说中起过开拓风气作用的积极因素，但不免为主导“新民”学说的君主立宪政治方案所局限。君武从抨击君主专制造成国民愚昧的认识出发倡议改造国民性，使

之最终将与共和革命结合起来，这就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上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君武传播西方新学，不仅欲以探求和展示救国拯民的现实道路，还欲向国人介绍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蓝图。他认为：“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他因此注意译介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与各流派的见解主张，倡议“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他还较为详细地介绍流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称赞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之新模范”，社会党人是“改造社会之新匠人”。在他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尔之华严界观》、《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等文章中，以大量的笔墨分别叙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卡贝、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思想生平，还较早地简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及其主要著作。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最初输入与传播。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君武曾被推定为执行部书记与广西分会会长，并参与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不久，他迫于学业，辞去这些职务。次年，君武从日本东京工科大学肄业，回到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并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事务。1907年春，他因避清廷缉捕，转赴德国留学，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返回国内。因此，他在这段期间的著述顿减。本集辑录的只有1905—1906年间他在《民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为《竞业旬报》出版而写的一篇序言。其间的主题仍然是继续介绍法国民主共和的历史及其学说，倡议在改造政府的同时也要改造民族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君武在《帝民说》一文中，重新译述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学说的基本观点及其思想渊源。他批评先前出版的卢梭《民约论》中文译本“无一语能道其义者，且全书无

一段与原本符者。译者固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他将卢梭的基本观点译为：“个人者，帝权之一部分也；帝权者，国家之一部分也。”“帝权非一私人，而以国中之个人组成之。”他进而解释说：“帝权即主权也，……由人民而后有，人民所不可自弃者也。”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真正理解卢梭明白倡导的“主权在人民之说”，他因而自豪地宣布：“今之真知卢骚，输入其真理于方醒之中国者，乃自予始也。”君武重新翻译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为革命派推翻君主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君武在辛亥革命前的文章撰译，以论史说理启人心扉，具有浑厚绵延的感召力。他在此期间挥毫写下的百余首诗作，则时常指陈时事、袒露胸臆，抒发激烈奔放的壮志豪情。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时，诗人开始投身政治活动，参与勤王之役。尽管此时他的政治倾向属于改良，其言志诗却已响起以武力救亡的铿锵之声：“四万万头刀炮中，神州今化战场红。”“宝剑自磨生远志，海天长啸起悲风。”（《感怀》）而当诗人转向革命之后，其言志诗更成为慷慨昂扬回肠荡气之作：“黑龙王气黯然消，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去国辞》）抨击君主专制以鼓吹革命，是诗人吟唱的主题。他痛斥“君臣昏聩河山耻”，腐败政治导致国土沦丧；揭露清政府残暴统治，“屡闻朝市兴文祸”，“无数沉冤厉鬼魂”（《去国辞》），“国家律例等虚纸，生杀但凭提督意”（《贱如蚁》）。他因此呼吁人民继承先民遗志，奋起争取自由：“西来黄帝胜蚩尤，莫向森林问自由。”“为奴岂是先民志，纪事终遗后史羞。”（《书感》）抗击列强侵略以救亡图存，是诗人吟唱的又一主题。他仿《木兰辞》而作《从军行》，通过对军人别母出征的叙述，再现当年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请缨杀敌的悲壮情景。诗末慈母勉儿出征之词尤为动人心魄：“母亦无所愁，母亦无所恋。不望儿生还，恐儿不力战。”诗人还在《华族祖国歌》中，历数祖国悠久文明与历代疆域，疾呼：“华族，华族，祖国沦丧尔罪不能偿。”“华族，华族，肩枪腰剑上战场。”

这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句，策励人们同仇敌忾，杀敌报国。

除了以诗进行政治宣传之外，君武还以诗抒发眷恋亲朋，悼念故人之情，或者赞美山川形胜，记录云影萍踪，倾诉去国怀乡的不尽情思。他还试图在诗作中反映自然科学常识。如《地球》、《壁他利亚》、《劳登谷独居》等诗当属此尝试。他在《劳登谷独居》中浮想联翩：“如使气球竟成就，孑身辟地适金星。”君武从二十世纪初叶的科技成就中受到启发，进而神往未来的航天术，其憧憬何等瑰丽。

君武是“诗界革命”的倡行者。他的诗在内容上“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君武诗稿自序》）；在形式上不拘旧格，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他建议南社同人：“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自然，君武并非当真主张抛弃历代凝炼的诗词格律；相反，自幼填词作对、诵读经史奠就的国学功底，始终使其诗作在创新时依然保持严谨典雅的韵味。他主张的是“旧锦翻新”，在继承旧诗体的基础上创作新诗。这一点，在其翻译外国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识者评论说：“近人译诗有三式：苏曼殊式，以格律轻疏之古体译之；马君武式，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之；胡适则白话直译，尽弛格律矣。”（李思纯：《仙河集》）君武开创的格律严谨的译诗体颇为人所称道。柳亚子曾赞其“融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治之”（《磨剑室拉杂话》）。

“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君武寄语南社同人共勉的这首诗句，恰是他为开启民智、鼓动革命而勤力笔耕的写照。

（三）

1911年10月，动荡的中国终于响彻辛亥革命的惊雷。刚刚取得德国工学学士学位的马君武，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赶回上海，于11月中旬出任《民立报》主笔。他接连发表社论与

评论，阐述创建共和国政权的各项大政方针，倡议尽快组织国会与临时政府，以奠定共和制度；速行征兵制，以保卫国家独立；告诫各省新政权应以国家人民之自由为念，不许存有争权夺利之心。他还严厉抨击与袁世凯妥协的调和论调，要求“新共和国之对袁世凯，当明认其为民贼、为公敌、为满奴，所有由袁世凯对民政府提出之议和条件，当断然拒绝之”（《论国人处置袁世凯之法》）。并且指斥同盟会要人汪精卫与立宪派杨度筹组拥袁上台的“共济会”，“未免太退化”（《言论自由》）。从11月下旬起，君武受推举参加各省代表会议，商议组建共和新政权。12月初，汉口各省代表会议推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3人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当革命党人在临时总统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的时候，君武率先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推选尚在海外的孙中山膺此重任。12月20日，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题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的社论，介绍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奔走美、英、法等国，争取列强在外交、财政上承认和支持中国共和新政权的情形，赞扬孙富于“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足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强调“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革命面临的困难。他宣布孙中山将于数日内回国，呼吁国人推拥孙中山为共和国的领袖。这篇社论一扫革命营垒中否定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企图将共和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的投降言论，为孙中山回国组建革命政府最先作了舆论准备。

12月27日，君武与景耀月等6人受各省代表会议委托，专程从南京去到上海，谒见刚从海外回国的孙中山。“首由君武申述欢迎之意，即谈到组织政府问题。”当晚，君武等人出席在孙中山寓所举行的同盟会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遵照孙中山关于实行总统制的提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日，君武等人返回南京，向各省代表会议报告谒见孙中山的经过。与会代表对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辩论甚久，莫衷一是。最后君武强调中山先生于此事持之甚坚，甚望同人勉予赞同，始获通

过”（《王有兰：《辛亥建国回忆》）。29日，各省代表会议终于以绝大多数赞成的票数，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代行参议院职权，推举赵士北为临时议长，马君武为临时副议长。当天，君武以广西代表资格，联同皖、苏、浙、闽4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要求再度修正两天前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增补大总统制定官制须得参议院同意等内容。“谓前者修正，卜夜行之，成于造次，应无效。君武持之甚激，旧案遂得再修正。自是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须得参议院同意。”（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3日，孙中山提名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君武受委为实业部次长。由于实业部总长张謇不久便辞职，该部事务悉由君武代理。当此革命政府初创之际，君武不辞辛劳，一面以实业次长和代理总长资格，主持振兴全国实业的部务工作；一面以参议员身份，参与商订共和政权的大政方针。1月间，他支持李四光等留学生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以“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为宗旨，自己也先后被选为该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他还受各省代表会议委托，督促陆军部制定北伐进军计划，并与景耀月、王有兰、吕志伊、张一鶚等共5人起草“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该草案于1月底完稿，共有49条款，当时人“颇称完备”。草案随即交付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修订，成为日后由孙中山正式批准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底本。

君武以赤子般的热忱，为新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忘我工作。同时，他又以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秉性，坚决反对向袁世凯妥协投降的言行。这当中，他曾因怀疑同盟会要人宋教仁媚袁，怒而将其殴伤。当孙中山同意践约让位于袁世凯后，南京临时政府派专使北上，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为了筹划“政党政治”以箝制袁世凯，也自请随同迎袁专使北上活动。君武未察其中用意，“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一日，两人相遇于南京

临时总统府，“宋以是质马，而遽批其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经胡汉民和黄兴劝阻解释，君武方悟宋之真心，遂谓宋“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胡汉民自传》）。这场误会以马之鲁莽而起，以马之悔过而息。它表现出君武为人耿直与革命忠心。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9日，君武通电解散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不久，他回到阔别12年的桂林。“为寻诸父老，把酒说民权。”（《别桂林》）他热情地向父老乡亲宣传民主共和的主张，还主持完成广西同盟会支部的改组工作。次年二三月间，他陪同孙中山访问日本，为发展中国实业筹集资金。然而，就在这时，传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噩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放弃一度醉心的实业活动，展开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

1913年4月13日，君武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在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宋教仁“实死于官僚派之手”，“故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执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1913年4月14日《民立报》）会后，君武前往北京，以参议员身份参加国会会议。27日凌晨，他与王正廷等国民党人获悉袁世凯政府即将在北京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立即赶往该处提出严正抗议，从而将袁世凯借款以镇压民党的阴谋昭露天下。此后，君武联合其他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抨击袁世凯违法借款的质询案，并且领衔通电，披露此事始末，斥责袁政府“违背约法，莫此为甚”。国会参、众两院先后议决否认大借款，袁世凯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于是加紧以武力消灭民党。对此，国民党分为“法律倒袁”与“武力倒袁”两派主张。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多属于前者，君武却以“激烈派”著称。6月，他离京赴沪，协助孙中山部署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在此期间，他陪同孙中山到澳门，督促广东都督陈炯明起兵反袁。随后他只身潜

往广西，图谋举事未果，遂于7月初转赴上海，参加当地反袁独立活动。8月初，上海战事失利，君武陪同孙中山离开上海，一度在台北策应福建讨袁军的行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转赴日本。

“辛苦造民国，栖皇别故乡。”“凭君马上治，容我去投荒。”

（《别桂林》）革命党人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华民国，落入革命后暴发的军阀官僚集团手中。君武满怀悲愤，被迫再度流亡海外。1913年冬，他应邀去德国留学深造。1915年6月，他在柏林工业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虽然去国万里，君武依然魂系祖国。他认为：“亡命异域，所以报国者，在输进西欧文明。”（《德华字典》序）“而新文明之输入，实吾国图存之最先着。”（《与高天梅书》）他因此“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民约论》序），盼望着早日回国“为新文明之运动”（《与朱屏子书》）。1916年5月，在护国运动蓬勃发展、袁世凯独裁统治行将崩溃之际，君武回到上海。8月，他将自己在半工半读生涯中独力编成的《德华字典》交付出版。同年底，他重新全文译成卢梭《民约论》一书。此书依据法文原著及英文译本对照翻译，较诸清末以来依据日文译本辗转传译的各种中文版本信达翔实。君武新译的《民约论》于191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吴虞曾在这年的私人日记里留下他与友人取阅此书的记载。君武致力输入民主和科学的“新文明”，无疑启迪着一代社会英贤。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继任的段祺瑞北洋军阀集团一度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但是，次年初，他们趁列强胁迫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之机，破坏约法，厉行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原国民党中的积极派别因此反对卷入列强争霸的世界大战。君武及其参与组建的民友社成为国会中力主反战的中坚，他们的活动体现出中华革命党人的政治意向。本集辑录的有关君武反战反独裁的电文和演说，在当时曾领舆论之先。君武在此期间的行动，还显示出倔强执着，不徇私情的个性。他曾不顾历年交谊，举杖怒打赞成参战的政学系骨干李肇甫；